

E R S H I S H I J I Z H I Z H O N G G U O

丛书主编 王先明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二十世纪之中国——乡村与城市社会的历史变迁

聚同道于乡野：华北乡村建设工作者群体研究

(1926—1937)

任金帅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山西经济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014036441

D693.62

丛书主编 王先明

20



二十世纪之中国——乡村与城市社会的历史变迁

聚同道于乡野：华北乡村建设工作者群体研究

(1926—1937)

任金帅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山西经济出版社



北航

C1715691

D693.62

2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聚同道于乡野：华北乡村建设工作群体研究 (1926—1937) / 任金帅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 11

(二十世纪之中国——乡村与城市社会的历史变迁 / 王先明主编)

ISBN 978 - 7 - 203 - 08354 - 2

I. ①聚… II. ①任… III. ①城乡建设 - 工作人员 - 群体 - 研究 -
华北地区 - 1926—1937 IV. ① D 693. 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55584 号

聚同道于乡野：华北乡村建设工作群体研究 (1926—1937)

著 者：任金帅

责任编辑：张小芳 席 青

装帧设计：柏学玲

出 版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山西经济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030012

发行营销：0351 - 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 - 4922127 (传真) 4956038 (邮购)

E - 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www. sxskcb. com

经 销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山西经济出版社

承 印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30. 75

字 数：440 千字

印 数：1 - 3 000 册

版 次：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203 - 08354 - 2

定 价：73. 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ERSHISHIJIZHIZHONGGUO

《二十世纪之中国——乡村与城市社会的历史变迁》丛书

2012年列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增补项目

2013年入选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2013年入选新闻出版总署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

2012年列入山西出版传媒集团重大出版工程项目



总序 GENERAL PREFACE

ERSHI SHIJI ZHI ZHONGGUO

20世纪的中国,经历着史无前例的社会变迁。这一变动的时代性特征之一,一定程度上体现为传统时代的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逆转为城乡背离化发展态势。伴随着中国与西方交锋以来军事、政治与经济的挫败,以及由此而来的知识分子的传统文​​化认同危机,现代化(或西方化)与城市化成为显而易见的社会潮流,传统城乡“无差别的统一”为日益扩大的城乡差异所代替,近代农民群体也从“士农工商”的中层政治身份一变而为“乡下人”这一饱含歧视色彩的社会底层,由此形成的城乡社会—经济与文化断裂不仅是20世纪社会结构畸形化与不平衡性的显著现象,也是至今仍横亘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

即使在当代社会发展进程中,巨大的城乡分离化也不容忽视,明显的城乡对比已经成为社会认同危机的主要表现之一。当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却面临种种困惑时,当乡村人才的空心化现象日益突出时,当城市化的进程突飞猛进时,当城市景观和生活方式与国际接轨时,城市人与乡下人

成为国人赫然的身份标识,现代日益扩大的城乡失衡与传统中国城乡之间的无差别的统一体形成鲜明对比时,深入研究城乡关系的历史变迁就成为一个理解当下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必要途径。此外,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认识,无论是政治家、社会学家还是经济学家,都不约而同地将之解析为城市与乡村两大基本单位,中国近代社会之不平衡性、半封建性、半殖民性等特点均可从城市和乡村社会结构的析分中被实证;而城乡之间的关系与特征,亦成为深度理解和把握近代中国历史的不可回避的焦点问题。

有时我们不得不惊叹“历史惊人地相似”!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农业破产”、“农村衰败”、“农民贫困”成为举国至重的话题,到新世纪以来被广泛关注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当代“三农”话语;从1926年王骏声提出的“新农村建设”问题,到新世纪以来持续推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尽管不同时代条件下,它所聚焦的时代主题内容会有所不同,但如此一致的话语或命题的背后却应该深伏着共趋性或同质性的深层致因。这至少给我们一个基本的提示,即农业、农村与农民问题,是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或乡村变迁中始终存在的一个重大课题。它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而导致的传统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破解后,乡村社会走向边缘化、贫困化、荒漠化和失序化的一个历史过程。“三农”的困境生成于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之中,这是近代以来城乡背离化发展态势下生成的一个“发展问题”。“三农”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问题,如果没有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发生,“三农”不会凸现为时代性问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时代没有社会问题,但是问题的呈现和表达不会如此集中在“三农”方面。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演进的客观事实的确显示了“三化”(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与“三农”二者的相关性。问题在于,会是怎样的相关?如何揭示二者互相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内在关系,并寻求最佳的或最有效的协调方略?

传统农业始终是一个低产出的行业,大部分农民的收入不可能迅速提高,得到高收入的人都是进城从事其他行业的人。社会分工、社会分化

始终伴随着城乡背离式发展趋向前行,从而整体上的贫富差距在城乡之间成为一种显性的社会不平等。人口逐渐从农村迁向城市,城乡之间的收入差别就是这种活动的推动力。但在先进国家里,这个工业化过程是在200多年里完成的。在此过程中总体的经济年增长率也不过2%~3%。这部分增长不是靠农业,而是靠在城市中发展起来的工业和服务业。农业生产的收入总是低的。为了平衡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政府都采取对农业补贴的办法,几百年来已经成为传统。反观我国的情况,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工业化的过程中非但没有补贴农民,反而是剥削农民;再加上对农民的身份歧视,事实上农民成为低人一等的群体,造成严重的城乡二元化结构,城乡收入差别变得极其突出。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10%左右,这部分增长几乎都是在城市中发生的,所以农业产出占GDP的比重从33%(1983年)降低到2005年的12%。在此过程中幸亏有几亿农民进城打工,沾上了工业化的光,否则城乡收入差距还会更大。我国农村金融的衰败,将大量农民储蓄调动到城市里搞非农项目,进一步使得农民收入增长困难。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说明了总体上收入差距发生的过程是相伴着工业化过程而发生的。这也是库兹涅茨研究收入分配的倒“U”形曲线的原因。

“三农”问题形成的历史成因和时代特征,如果仅仅局限于现实的考量,或将既无法捕捉到问题的实质,恐也难以探寻到真正的求解之道。事实上,百年来关于中国乡村发展论争的各种主张和方案,以及由此展开的各种区域实验与社会实践,其丰富与多样、繁难与简约,已经有着足够的样本意义和理论认知价值。在百年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审视“三农”问题的历史演变,或许会有更深刻的思想领悟!历史的选择和运行有着它既有的逻辑进程,因此有关中国乡村道路选择的理论思考和种种分歧,却依然为我们的历史反思和长时段观察提供了理性辨析的基础。

近年来,对于近代城乡关系的研究存在诸多薄弱之处。学界研究的主要态势要么关注城市化历史,要么偏重于乡村史研究,城乡关系仅仅作为这些研究的副产品而出现;城市与乡村是一个预设的、对立的地域单元。

但是事实上,无论是城市化进程还是现代化进程,从根本上来说其实就是一个乡村社会变迁的过程: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从农耕文明转变为城市文明,从传统生活方式向现代生活方式的演变过程。如何广阔而全面地呈现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并深入揭示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演进轨迹与规律,从而为当代中国发展的路向选择和理论思维提供丰厚的历史经验与启示,当是这一丛书设计的基本诉求或宗旨。

王先明

2013年1月7日于津城阳光100国际新城西园



序

PREFACE

ERSHI SHIJI ZHI ZHONGGUO

乡村的理想守望者

传统中国的读书人,关心家事、国事、天下事,农事自然也在其列,但所论多钱粮租赋及乡村治术,立于农民利益本身和志于改造乡村者并不多见。依儒家的传统,耕田以事稼穡,读书以知礼仪,是立命修身的法则。不过在世俗生活中,耕读传家更多是用来指导家庭子嗣的分工,拓展家族发展的空间,也有分散风险的考量。这是家族的梦想,而不是社会的理想。居于乡间的士绅,多以其政治、道德、知识的权威来领导地方,沟通皇权与基层,维系着千年不变的社会秩序。不过到了“百年锐于千载”的近代,乡绅始终是传统的守护者,做不了乡村的改革者,甚至成为革命的对象。

在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后,读书人也渐渐从乡间移居到城市。在那里,新式的学校教育和工业化带来更多的机会,也有更舒适的西化生

活。伴随地方精英的进城,城乡之间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落差也日渐扩大,同时乡间苛捐杂税、社会动荡并不稍减。基于中国仍是宗法农业社会的基本国情,农村的相对衰落和失序并不代表其重要性的降低,仍是决定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走向的关键因素。近代的一些主要政治力量和知识精英对此都有清醒的认识。章士钊的“农国论”、梁漱溟的“农本社会论”虽然被批为与工业化潮流相逆,但立论的基本国情却不错,只是针对同样的病症,各人开出的“处方”不同罢了。

20世纪早期,在乡绅阶层从农村撤退的时候,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两大政治力量开始在工农大众中寻求支持,践行其“革命理想”。这也是近代政党将斗争舞台由“朝堂”转向“群众”的重要标识。经过大革命时期的恩怨离合,两个政党都认识到争取农民支持的重要性。共产党很早就展现出在民众运动方面的天赋,此后更找到了土地革命及武装割据的路线,据此与国民党政权分庭抗礼。国民党则以“三民主义”为依据,竭力推动农村经济复兴,还通过重建农会、强化保甲来密切党农关系。不同的组织形态与工作方式导致效果判若云泥。共产党深入农民之中,以党员组织和农运分子为中心来贯彻党的主义,将“精神启蒙”和“土地革命”相结合,激发出实际的革命行动。而国民党始终依赖乡村保甲等组织和地方上的既得利益精英集团来实施社会控制,平权与减租的政策都未得到有效贯彻。

农村的贫穷、衰败和落后也引起知识界的广泛关注,以梁漱溟、晏阳初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怀抱着改变乡村面貌、复兴中国文化的理想,走进山东邹平、河北定县等地的村落,兴起了乡村建设运动。知识分子的“下乡”,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知识精英的回流。在更深层意义上,他们既不同于共产党的农运积极分子,也不同于国民党治下的保甲长,他们寻求的是改良的道路。不要革命,不靠官僚,希望通过知识、理念和技术的输入,促进农村经济、教育、卫生和管理的进步,将农民从愚、穷、弱、私的状态下解放出来。这不是革命的蓝图,而是改良的试验。相较于共产党建立起的革命武装,相较于国民党握有的行政权力,他们拥有的只有知识和理想。在很多时候,还不得不依赖于国民党的官僚体制。这样的乡村建设注

定是脆弱的,但这样的理想情怀无法不令人感动。

在 20 世纪 30 年代,乡村建设运动吸引众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加入,政府也不能不加以注意。据统计,参加乡村建设运动的学术团体和教育机构达 600 多个,建立各种实验区 1000 多处。乡村建设运动除有少数知名学者的引领外,还有更多务实的工作者,这是一个初具规模的社会群体。回溯学术史的延展脉络,乡村建设运动研究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大体上对“人物史”、“思想史”、“运动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丰富的成果,近年更注重以整体史的眼光,探讨乡村建设运动与乡村政治、经济、教育、风俗变迁的关系。但是,在乡村建设运动的主体研究方面仍然不足,除乡建领袖人物、乡建派别差异等受到较多关注外,具体从事实务工作的乡建工作者群体的形象仍然模糊。

在这样的脉络下去看任金帅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完成的《聚同道于乡野:华北乡村建设工作者群体研究(1926—1937)》这一专著,难免感触良多。有些是在书内的,有些则在书外。本书是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以 1926—1937 年间的华北主要乡村建设区域为中心,考察乡建工作者群体的产生背景、形成路径、群体特征、实践活动、工作方式、社会认同及群体走向等问题。作者广泛搜集档案资料、农村调查、个人文集及报刊文论,在此基础上勾画出乡建工作者群体的群像,并将群体与乡建进程、乡村社会紧密相联,对乡建运动的成败进行再审视。全书主题清晰,资料充实,本书的出版将有助于弥补已有研究之不足,完善对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主体认识。

鉴于乡建研究已有的丰富成果,作者在研究视角方面进行了深入思考。他将自己的思想路径归纳为“一高一低”的结合:“高”者,是说立足于时代高度,将乡建运动置于当时农村变迁之大场景中,对乡建运动的内在构成要素及其与社会变迁的关联进行再审视。“低”者,是指眼光向下,既关注乡建领袖,也关注实务工作者;既关注性质结果的判断,更关注过程之推进。这一视角应该说是可取的。乡建工作者虽说是群体,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职业或者社团组合,群体认同的基础是共同的事业及改良的理

想,这意味着群体的松散性和多变性。群体之中的个体选择,既有社会因素的影响,也受制于个人之观念与动机。作者在分析中贯彻了这一意旨,书中关于权力网络中的乡建工作者及群体分化走向的讨论都具有创新意义。

在具体的问题解析中,作者注重将社会运动主体的“群体”放置于历史演进的“过程”之中。不可否认,在许多学术议题上,对事件、组织、制度、思想乃至性质、结果、特点的判断都是应该虑及的基本问题。通常来说,组织活动、制度文本、思想论著等也提供史实建构和理论分析所需之史料,但容易产生的弊端就是忽视了“人”的主体性。表面看来,历史事件或许可以易于条理,因果联系似乎易于断定,但失去“人”的后果是丧失了历史的动态性和真实性。而在“过程”的层面,过去的乡建研究也不太注重,不论是全盘西化派学者如陈序经等人的批评,还是马克思主义派认为排斥革命则不能根本解决乡村问题的论断,都是着眼于结果。如以“根本解决”为标准,乡村建设运动的确回避了政治体制和土地制度的问题,但是直面了教育、卫生、经济乃至思想观念等方面的真实境况。只有进入历史的过程与细节当中,才会发现理想要“照进”现实有多么的困难。是先改变自己,还是改变乡民?是曲就于村落的传统,还是全力革新?是依赖于官僚体制,还是独立推进?当现实“撞破”梦想的时候,还被指为“吃乡建饭的新阶级”。理想,并不会因其远大而得到每个人的青睐。如此种种,当乡建工作者将个人命运投注于乡村的前途时,发现其中还存在这么多的隔膜。

作者根据所掌握的史料,对这些问题都进行了回答,群体的构成、工作及生活状态也逐步显现。乡建工作者群体拥有理想与知识,但走入农村做实际的工作,最难转换的仍是“角色”问题。在“上联下接”的动员方式中,他们承担了主要的实务工作,做出生活方面的牺牲,但在“农民化”和“理解农民”方面始终难以真正进入“角色”。他们为解救农民而来,农民自己却成为旁观者。这和共产党在农运之中直接去“做农民”和围绕农运积极分子来扩展党组织的方式是不同的。在群体之中,个体成员的思想认

识也并非全然一致,有的“半路出家”,有的又“半路还俗”。当乡建运动背负挽救乡村、复兴文化的使命而不能承受其重时,相当部分的乡建工作者却自知只是匆匆的过客,不会真的“落地生根”。这样的分析结果让人沮丧,让“理想”蒙上灰尘,却更贴近真实,也填补了乡村建设运动的“血肉”。

本书关于政治力量与社会力量、制度与人治问题的分析既是对全书观点的总结,也有助于从“群体”与“国家”、“社会”关系的角度来深化对乡建运动成败之因的认识。乡村建设运动希望在武装的暴力革命和政府的失败治理之间找到一条新路,但在如何处理与国家政权的关系问题上却面临着两难。作者认为,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回避政治力量而主要依靠动员社会力量是基于对农村现实的判断。原因在于乡建工作者希望能够自下而上发现农村问题,愿意立于农民的立场来改良农村社会,避免为政府所左右。但是,既然是改良而非革命的行动,必然要在国民党所设定的体制内寻求空间。乡建运动能够得以开展,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地方实力官员的支持,尽管这些官员的支持是出于各种目的。但是中央政权对此只保持有限认同与支持,对运动的长久发展来说并非好事,而地方实力人物的权争变动,也会直接影响到乡建运动的开展。在这种情势下,工作者只能转而去借重人情与习惯的力量,藉此拉拢与民众的感情,动员民众参与乡建。作者揭示出的乡建运动中这种既想保持独立性又不得不借重于政治力量,既想融合于乡民之中但又无法真正走入田野,既想建立制度推进事业又不得不曲就于人情习惯的复杂状态,实际上说明,乡村的改革与进步的确需要国家与社会的联合推进。在世界范围内看,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农村都需要做出相当程度的“奉献”,如劳力、人才、资本、土地等资源,这一不对等的流动需要由国家来加以校正。而当时的国民政府无法实现减租平权的承诺,虽有推行识字运动、经济建设等举措,却没有实际转移资源到农村,也无力建立起教育、卫生、医疗等方面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

从农村的实际需求来看,乡村建设运动中的“政、教、富、卫”等事业所

提供给农民的就是一种公共服务产品。这些都是农民所迫切需要的,而其中最为核心的还是“富”。但乡建工作很难直接提供“富源”,只能以教育为先导,以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来推动农村的改变。这一道路未必不会成功,但注定是艰难漫长的。乡建运动依托的是学者、学术机构和社会团体,缺乏组织权威和社会资源。他们可以在教育方面尽展所长,提升农民的知识与观念,实际上这方面的成就也最为显著。但是经济方面的改变,却需要依靠国家与市场的力量方才能够立竿见影。

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有了耕作的土地,经济得到改善,原来革命所主张的“根本问题”似已经解决,但是农村的教育、卫生、医疗、观念等问题,一仍其旧。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突飞猛进的同时,城乡差别仍在继续扩大。好在国家已经开始注重资源的回哺,在减免税负的同时,也在提升公共保障及服务的水平。但是中国农村太大,情况太复杂,农村依然需要全社会的关注与投入。数年前温铁军等农村问题研究学者在河北、山东等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故地重开乡建研究院,虽然不太可能恢复昔日的荣光,但至少可以为新农村建设注入新的力量。相较于不少农村基层政权热衷于建新房、显政绩,让农民“被上楼”的形式主义,他们在乡村推行的职业与技术培训无疑更有意义。

梁漱溟的晚年口述问,“这个世界会好吗?”他对中国文化的复兴仍然乐观。不要让中国的城、乡成为两个世界,不要让中国的城、乡成为身份的标签。只有在全国的农村真正兴盛后,国家的复兴才会实现。当市场遗忘了农民、农业和农村的时候,国家不应该遗忘,知识分子也不应该遗忘。民国乡建知识分子的衣冠背影早已远去,而今日的中国乡村仍然需要他们的呼召,也不会忘记他们的守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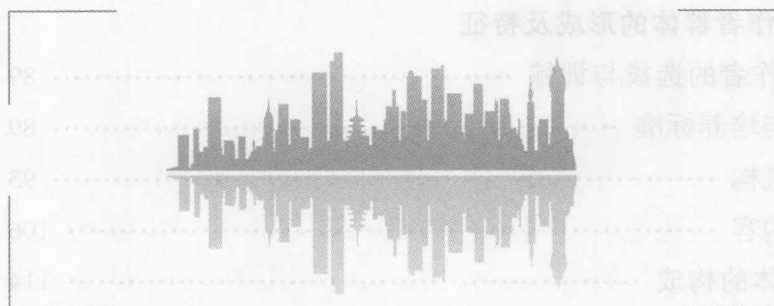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离挽救农村、复兴文化的理想还有很远的距离,但是当时下乡去的“洋博士”、“读书人”仍留下了深深的印迹。“洋博士”在和“庄稼汉”相遇的时候,开始难免会互相打量,评头论足,但在意识到互相的真诚以及生活、事业上的共同需要后,交情就会增进,原本两个不同的世界也有融合的可能。乡建运动在改变农村的同时,也塑成知

识分子参与社会的“新传统”，感召着后来人。

坐而论道，不如起而立行。论道易，立行难，而乡建工作者两者兼备。
每阅及此，油生感佩。是为序。

魏文享

2013年1月27日



目 录 CONTENTS

ERSHI SHIJI ZHI ZHONGGUO

绪 论

一、选题缘起	1
二、相关概念说明与研究范围界定	3
三、学术史回顾	11
四、研究方案	35

第一章 乡建工作者群体产生的背景

第一节 近代城乡关系的结构性失衡及其影响	42
一、城乡殊分：农村经济危机的凸显	43
二、精英离乡：乡村社会阶层的分化与人才流失	56
第二节 乡村建设运动与人才需求	68
一、“最强力之潮流”：乡建运动的兴起	68
二、“下乡去”：新兴知识分子阶层的转向	78



第二章 乡建工作者群体的形成及特征

第一节 工作者的选拔与训练	89
一、选拔与培养标准	89
二、训练机构	93
三、训练内容	106
第二节 群体的构成	114
一、数量的统计	114
二、社会身份的分析	119
第三节 薪俸待遇	129
第四节 “人才中心圈”：群体之间的互动	143
一、互动之主、客观需求	143
二、全国性的互动与联合	148
三、区域性的交流与合作	154

第三章 乡建工作者群体与乡村社会改进

第一节 进行社会调查	165
第二节 推进乡村民众教育	175
第三节 复兴农业经济	195
一、农业技术的改良与推广	195
二、建立合作社等新型农村经济组织	199
第四节 推广医疗卫生	206
第五节 “模式化”的困境——人员与事业的脱节	216

第四章 权力网络中的乡建工作者群体

第一节 乡土社会权力结构与事务处理方式的近代走向	229
一、乡土社会权力结构的历史变迁	
——以绅士为中心的考察	232
二、乡村事业内容的变更	239